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二十辑)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编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执行编辑 刘安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

编辑出版: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印刷: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科技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9.5 字数:441千字

ISSN 1000-5374



刊号: $\frac{\text{ISSN}}{\text{CN}}$

50

代号: $\frac{\text{国内: 38-7}}{\text{国外: BM300}}$

鄂新出专刊
字(2003)第191号
定价: 30.00元

谨向资助本辑出版的美国唐研究基金会

暨基金会理事长罗杰伟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二十辑)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编

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

2003年12月

目 录

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的一次短暂变革

- 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四····· 黄惠贤(1)

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

- 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 何德章(7)

- 刘琨、卢湛赠答诗始末推论····· 董慧秀(19)

- 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 山口正晃(30)

- 关于周隋之际的洛阳经营····· 魏 斌(52)

- 诸葛亮祭祀所见魏晋隋唐制祀的变化····· 李文澜(64)

- 跋《千金序》····· 冻国栋(76)

- 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 姜望来(85)

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

- 侧重于灾害资料的统计与分析····· 靳 强(97)

- 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 黄 楼(110)

- 唐玄宗御注《孝经》考····· 朱 海(124)

- 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 张 宇(136)

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

- 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刘惠琴 陈海涛(145)

- 唐代的医学教育及医人地位····· 于赓哲(155)

- 从“开元寺三门楼题刻”看唐代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简梅青(166)

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

- 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 冻国栋(176)

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

- 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 陈国灿(187)

-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 刘安志(199)

- 《大谷文书集成》佛教资料考辨····· 刘安志 石墨林(214)

《大谷文书集成》(貳)人名地名索引

- 附录与其他吐鲁番文书互见的人名地名····· 石墨林(284)

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的一次短暂变革

——散骑诸官研究资料之四

黄 惠 贤

东晋时期,中央决策机构(中书省)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变革,我在撰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涉及过,主要的结论自认为是可以成立的;但资料的运用和分析确很粗糙,且有错误,这篇短文意在纠正谬误。由于掌握的资料仍然不足,最后的部分,只能作点蠡测,希望得到同仁的赐教、批评。

短文分三部分:一、有关通直散骑侍郎的始置;二、有关并中书入散骑的一般推断;三、蠡测三点。

一、通直散骑侍郎的始置

《通典》卷 21《职官典·侍中》附“通直散骑侍郎”条,原注有云:

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及太兴中,元帝使一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谓通直散骑侍郎,或单为“通直郎”。

今本《晋书》卷 24《职官志》亦载此事,但内容稍有出入。《晋志》载:

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及太兴元年,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后增为四人。

两相比较,《通典》泛称的“太兴初”(318—321),《晋志》确指为“太兴元年”(318);元帝使“一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晋志》作使“二人”,且称“后增为四人”。

早于今本《晋书》和《通典》的梁沈约撰之《宋书》亦载此事,见其卷 40《百官志下》。《宋志》有云:

通直散骑侍郎,四人。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后增为四人。员外散骑侍郎,晋武帝置,无员。

“员外”者，正员之外，无员额限制之谓。知《宋志》“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四人”中，“四人”二字，为衍文无疑。《太平御览》卷 224《通直散骑侍郎》条称：

晋《太兴元年起居注》曰：“置通直散骑侍郎，四人。”

推敲上引四书，当以晋《太兴元年起居注》及《宋书·百官志》为本。知“通直散骑侍郎”一职，始置于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初为二员，寻增至四员。

西晋末之散骑省，原有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和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至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增置通直散骑侍郎。“六散骑”之称始备。

西晋末，散骑省文属门下。门下省有正、副长官侍中和黄门侍郎，员额各四人，“掌门下众事”。散骑省除员额无限、清显冗闲的“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之外，有正、副长官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各四员；加上“通直散骑常侍”二员，其总数为十员，比门下省长官还多。

司马睿于丁丑年(317)三月，称晋王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次年(戊寅)三月称帝，即东晋元帝，改元太兴。所谓“太兴元年”，只不过是戊寅年三至十二月的十个月。据晋《太兴元年起居注》和《宋志》的记载，东晋元帝于此年(即帝位初的十个月)中，从新置“通直散骑侍郎”，到把员额从二人增加到四人，文属门下的散骑省中，有执掌、有员额限制的正副长官从十人增加至十四人；如果再加上通直散骑常侍“晋江左置四人”，^①则为十六人，是门下省正副长官的一倍。若此，东晋元帝即位之初，通直散骑侍郎的新置，和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员额的激增，似乎与散骑省职权之扩大、职务之繁忙有关。

二、并中书入散骑省时间一般推测

东晋时，散骑省的职权曾经一度空前地扩大。关于此一变化，《唐六典》卷 9《中书令》条原注有云：

(晋)中兴之后，以中书九(广池本眉注：“‘九’，《分纪》作‘之’。疑《唐六典》‘九’为‘之’，形近而讹”)任，并入散骑省；后复置之。

并中书省入散骑省，是中央职官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通典》也有类似的记载。《通典》卷 21《职官典·散骑常侍》条称：

(东晋时)以中书职入散骑省，故散骑亦掌表诏。

“掌表诏”，是指典管上行之章表奏疏和下达之诏命勅令，责任重大、职务繁忙，这正是西晋时期被美称为“凤凰池”的典掌机要的中书省之主要职能。但上引《唐六典》、《通典》只说此事发生在晋“中兴之后”或东晋时。东晋立国 102 年(318—420)，其时间跨度太长，推断未免过于泛泛。

《唐六典》卷8《门下省·左散骑常侍》条之本注,提供了可供进一步探讨的很重要的线索。本注称:

东晋并中书入散骑省,故庾亮《让中书笺》曰:“方今并省,不宜多官。往以中书事并附散骑,此事宜也。方今:喉舌之要,则任在门下;章表诏命,则取之散骑,殊无复立中书也。”

“往以中书事并附散骑省”句上,《六典》广池本眉批云:“‘往’下,《分纪》有‘年’字。”

在《让中书笺》中,庾亮认为:一、“往以中书事并附散骑”,或“往年以中书事并附散骑”,“此事之宜也”。说明他充分肯定此前裁撤中书省或以中书事并附散骑省的措施是很恰当的;二、“方今”,即庾亮上《让中书笺》的时候,正值“并省”机构、裁减官员,既然“喉舌之要,则任在门下;章表诏命,则取之散骑”,就没有必要“复立中书”了。执政在此时任命他出任中书,他自然应该上笺辞让。这两点正是庾亮《让中书笺》的基本内容,与前引《唐六典》、《通典》有关并中书入散骑省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庾亮,《晋书》卷73有传。记载,庾亮病逝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因此,东晋并中书入散骑省的变革,发生在东晋初年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

三、蠡测三点

(一)“并中书入散骑省”之上限

《通鉴》卷90记载,西晋愍帝建兴六年(317)三月辛卯(初九),琅邪王司马睿即晋王位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改元建武,始备百官。四月丙辰(初四),立世子绍为晋王太子,以王导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贺循为中书令,刘超为中书舍人,孔愉长兼中书侍郎。此处,《通鉴》当据《晋书》卷6《元帝纪》、卷65《王导传》、卷68《贺循传》、卷70《刘超传》、卷78《孔愉传》综述。《刘超传》称:

中兴建,为中书舍人,拜骑都尉、奉朝请。时,台阁初建,庶绩未康,超职典文翰,而畏慎静密,弥见亲待。

资料说明,司马睿即晋王位时,仍承袭西晋之制,不仅中书省职官齐备,地位十分显赫,而且省内事务之运作,仍凭下级办事人员“舍人”之类负责。

建武二年(318)三月癸丑(初七),愍帝凶问至建康,晋王睿斩辂居泸。丙辰(初十)百僚上尊号。是日,晋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兴”。庚午(二十四日),立王太子为皇太子。《晋书》卷73《庾亮传》载:

中兴初,拜中书郎、领著作,侍讲东宫。其所论释,多见称述……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

《通鉴》系此条于“庚午，立王太子绍为皇太子”、“聘亮妹为太子妃”之后。四月丁丑朔，进王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元帝纪》、《王导传》）。此后，终太兴年间（从公元318年阴历四月至322年十二月），未见任命中书主要官员之明确记载；联系小文第一节通直散骑侍郎始置和通直常侍、侍郎员额之激增，是否可以假定太兴元年四月或稍后，为并中书入散骑省之上限？

（二）“并中书入散骑省”之下限

东晋“并中书省入散骑省”的下限，我以为可以庾亮、刘超的经历进行推测。《晋书》卷73《庾亮传》载：

明帝即位(323)，以(庾亮)为中书监。亮上书让曰……

《庾亮传》录此表甚详；《文选》卷38亦载此表，文字略同，但称此为“庾元规《让中书令表》”。唐李贤注云：“诸《晋书》并云‘中书监’，此云‘令’，恐误也。”庾亮是明帝穆皇后（即前引元帝太子绍妃）之兄。《文选》录此表七百余字，从“臣亮言”开始，至“犹生之年矣”结束，首尾似完备。让表引经据典，以“姻娅之嫌”，反复申述以“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之主旨，只字不涉及“并中书入散骑”和“殊无事复立中书”等事。此与前引之《唐六典》注录庾亮《让中书笺》不合；《通鉴》系“以后兄亮为中书监”于明帝太宁元年（323）六月壬子（三十日）“立妃庾氏为皇后”之后是恰当的。《晋书·庾亮传》载庾亮任中书郎之后，有云：

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时，王敦在芜湖，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颙远矣！”因表为中领军。

《御览》卷220《职官·中书监》引《王敦表》曰：“中书令、领军庾亮，清雅履正，可中书监；领军如故。”田余庆先生据此推断：明帝太宁元年（323）四月，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交谈，叹服，乃一表庾亮为中领军，再表加中书监。而亮原已居中书令，本传失载。^②若此，则庾亮为中书令当在明帝太宁元年四月之前。

刘超任中书舍人，受到器重信任。《晋书·刘超传》载：

寻出补句容令，推诚于物，为百姓所怀。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贲。至超，但作大函，邛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百姓依实投上，课输所入，有踰常年。入为中书通事郎，以父忧去官。既葬，属王敦称兵，诏超复职，又领安东上将军。寻六军败散，唯超案兵直卫。帝感之，遣归终丧礼。

太兴五年（322）正月乙卯（初一），元帝改元永昌；戊辰（十四日），王敦起兵武昌，率师东下。“王敦称兵”，当指此事。此前，刘超已由句容县令“入为中书通事郎”，即中书侍郎。按晋制刺史守令等莅民之官，一般任期六年，刘超以太兴元年中出任句容令，至四年底，任职不足四

年。此次刘超提前入迁中书郎,大概与元帝“大赦改元”和政制改革有关。因此,我怀疑以庾亮为中书令、复置中书省诸官,当在此前后。

(三)“并中书入散骑省及复置中书省”之缘由的推测

元帝即位时,“王与马,共天下”之格局已经形成。王氏势力之主要代表人物是掌握兵权、雄据江荆的王敦和内总机要、控制朝政的王导。司马睿能够立足建康、称帝江左,得力于王导兄弟的拥戴和周旋;但崇尚刑名的司马睿,又决非是个“失驭强臣”之君王;因此,在相互联合中展开相互排斥、相互争斗在所难免。

司马、王氏“主、相之争”约起于元帝即位后的三个月。《晋书·元帝纪》载,太兴元年(318)六月,“改丹杨内史为丹杨尹”。《通鉴》卷90“太兴元年六月甲申”(初九)条称:

以刁协为尚书令,荀崧为左仆射。协性刚悍,与物多忤,与侍中刘隗俱为帝所宠任;欲矫时弊,每崇尚抑下,排沮豪强;故为王氏所疾,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

按《通鉴》所载,实综合《晋书》卷69《刁协传》、《刘隗传》而成。同书卷98《王敦传》称:“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卷65《王导传》也说:“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导)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两传均指明元帝即位后,刘隗、刁协用事,王氏遭到疏远,但未举出疏远之实际例证。按司马睿称晋王时,王导的主要职任是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领中书监。现在,用刁协为尚书令,以刘隗任丹杨尹,尚书省和京师建康之大事,元帝有可能控制。《晋书·刘隗传》称,隗长兼侍中,代薛兼为丹杨尹,“隗虽在外,万机秘密,皆豫闻之。”因此,我怀疑“并中书入散骑省”,正是元帝“疏间王氏”、使王导“甚不平”的措施。推测“并中书入散骑省”,曾得到外戚、士族庾亮的支持;庾亮任散骑常侍,大概也正在此时。

中书省掌诏命奏疏,机要所在,其权力似应集中。主要长官有中书监、令各1人,中书侍郎4人,共6人。并中书入散骑省后,除员外常侍、侍郎外,实职长官有常侍、侍郎,通直常侍、通直侍郎各四人,共计16人,与东晋立国之初“并官省职”的总趋势不合,是否由此在约四年后又“复置中书省”?缘由待考。《晋书》卷69《周顗传》载:

初,(王)敦之举兵也,刘隗劝帝尽除诸王,司空(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甚衔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导执表流涕,悲不自胜,告其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按王敦此次起兵于永昌元年(322)正月,三月攻下石头,十九日杀周顗。推测“复置中书省”于此时稍前,庾亮亦约在当时为中书令。从《周顗传》看,此时王导并未任职中书省。从以上推测,我怀疑:“并中书入散骑省”,似与疏远王氏有关;而“复置中书省”,则未必与王氏家族的兴废有关联。

注 释:

- ① 今本《宋志》载:“通直散骑常侍,四人。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晋江左置五人。”《晋书》卷24《职官志》略同,唯“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直”,具体指明是“泰始十年(275)”,尤其是称通直散骑常侍“江左置四人”。《御览》卷224《职官·通直散骑常侍》条引陶氏《职官要录》曰:“晋太始十年诏东平王(司马)楙为员外常侍,通直殿中……通直之号,盖自此始也。”同书同条又引《宋书》曰:“通直散骑常侍,员四人。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晋江左置四人。”知《晋志》有据;《宋志》今本,“晋江左置五人”之“五”字,为后人传抄之讹。从行文来看,“晋江左置四人”似指东晋立国初。
- ② 见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09页,109页注①。

北魏迁洛后鲜卑贵族的文士化

——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三

何 德 章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南迁北族出身者籍贯，实行门阀制度，鼓励其上层与汉族世家大族通婚，促成北魏后期“胡人士族”的形成，治史者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①。孝文迁洛，主旨在于文治，鲜卑族上层的士族化，亦不过是其文治政策的一种手段，而鲜卑族上层的文士化，更是所谓“胡人士族”得以成立的关键。北魏迁洛以后，鲜卑族上层文化面貌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文治，“知书”是对鲜卑族人特别是其上层的基本要求，但迁洛之初，鲜卑族人对此并没有正确的认识。《魏书》卷21上《广陵王元羽传》说，孝文下令迁洛后返回平城：

高祖引陆贽、元赞等于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慨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

既迁洛阳，随着门阀制度的实施及官制改革重文轻武，“北人何用知书”的言论因而消歇，崇尚文化在迁洛的鲜卑贵族中蔚为风气，这在邙洛出土的鲜卑贵族的墓志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延昌三年《元颺志》^②：

生而恢岸，幼则奇伟。恭孝之心，睦睦于韶年；忠亮之操，蹇蹇于弱岁。韵宇神凝，雅度清简，倾衿慕道，殷勤引德，俊士游于高门，英彦翔于云馆。若夫优游典谟之中，纵容史籍之表，才逸自天，制每惊绝。弱冠有声，拜奉车都尉，……又为步兵校尉，并非其好。君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章，引绿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氏而同侣，古由今也，何以别诸！……穷达晏如，臧否若一，志散丘园，心游濠木。

《志》称为拓跋焘太子拓跋晃之子、阳平王某第六子，检《魏书》卷19上，阳平王新成传下附有子颐、衍、钦三人，无元颺其人。据《志》，他卒于延昌三年(514)，年45，则其志学之年，当太和中后期，而招朋纳友，以琴书自娱，则在迁洛之后。

元颺事迹不见于史传，其兄元钦字思若，“少好学，早有令誉，时人语曰：‘皇宗略略，寿安、思若’”。建义元年《元钦志》对元钦文才说得更为详细：“三坟五典之秘，甲岁已通；九流七略之文，绮年尽学。齿在童稚，雅为献文所矜，未及弱冠，偏蒙高祖流爱。出入之际，与众不同，宴会之际，每见优礼。……至于秋台引月，春帐来风，琴吐新声，绿流芳味，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岩里四公，曷云能上。”据《魏书》卷19上《汝阴王天赐传附传》，寿安名修义，乃元颺从兄弟辈，“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孝昌二年《元寿安志》则称寿安为名，修义为字，与《魏书》相反。《志》称寿安“孝以事亲，因心自远，友于兄弟，不肃而成。弱而好学，师佚功倍，雅善斯文，率由绮发，自是藉甚之声，遐迩属望；珪瑚之器，朝野归心。寿安、元钦二人以文名，他们好学而受到称颂，显然与太和时期提倡文治的大背景有关，从元钦、元修义好学有令誉，可以判断《元颺志》所说不虚。但此三人均不见有何著述。迁洛以后，元氏后进以文名者的水平，无疑远远超过他们之上。《魏书》卷18《临淮王谭传元彧附传》说：

彧少有才学，时誉甚美。侍中崔光见彧，退而谓人曰：“黑头三公，当此人也。”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虽无优劣，然安丰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沉雅。”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楚尽]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彧姿制闲裕，吐发流靡。琅邪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所著文藻虽多亡失，犹有传于世者。

安丰王元延明附传见于《魏书》卷20《安丰王猛传附传》，传称他“博极群书，兼有文藻，鸠集图籍万有余卷。性清俭，不营产业。与中山王熙及弟临淮王彧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虽风流造次不及于熙、彧，而稽古淳笃过之。……所著诗、赋、铭、诔三百余篇，又撰《五经宗略》、《诗礼别义》，注《帝王世纪》及《列仙传》。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引之在馆。其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太昌元年《元延明志》对其文才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志》称：

自有大志，少耽文雅，肆情驰骋，锐思贯穿，强于记录，抑亦天启，必诵全碑，终识半面。故河间所不闻，陈农所未采，莫不祛疑辨惑，极奥穷微，雕虫小艺，譬诸绮縠，颇曾留意，入室升堂。实使季长谢其诗书，伯喈归其文籍。……又监校御书，时明皇则天，留心古学，以台阁文字，讹伪尚繁，民间遗逸，第录未谨。公以向、歆之博物，固雠校之所归，杀青自理，简漆斯正。……既业冠一时，道高百辟，授经侍讲，琢磨圣躬，明堂辟雍，皆所定制，朝仪国典，质而后行，加以崖岸重深，风流旷远，如彼

龙门，迢然罕入。惟与任城王澄、中山王熙、东平王略、竹林为志，艺尚相懽。故太傅崔光、太常刘芳，虽春秋异时，亦雅相推揖。

元熙事迹见于《魏书》卷19下《南安王桢传附元熙传》，传称他“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然轻躁浮动。……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与袁翻、李琰、李神偶、王诵、裴敬宪等“才学之士”结为“知友”。孝昌元年《元熙志》志亦称：“幼而岐嶷，操尚不群，好学博通，善言理义，文藻富赡，雅有俊才。……性不偶时，凝贞独秀。得其人，重之如山；非其意也，忽之如草。是以门无杂宾，冰清玉洁，有若月皎云间，松茂孤岭。见者羨其高风，望者人情景慕。”元熙弟元略亦以才学知名。《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追先寺条”：元略在元熙至江左，“萧衍素闻略名，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赡，甚敬重之。谓曰：‘洛中如王者几人？’略对曰：‘臣在本朝，承乏撮官，至于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鸳鸾接翼，杞梓成荫。如臣之比，赵咨所云：车载斗量，不可尽数。’元略能随口引用韦曜《吴书》所记赵咨对魏文帝语以答，说明他“文学优赡”虽不见于《魏书》本传，但并非虚语。

元彧、元延明及元熙三人是北魏洛阳时代皇族“博古文学”的代表。而墓志中关于迁洛之后宗室人物好学而不见于史传记录的情形还有很多。神龟二年《元祐墓志》：

高宗文成帝之孙，太保齐郡顺王之世子……又道锐志儒门，游心文苑，访忘食，徙义遗忧。虽甄城之好士，平台之遗爱，无以过也。

正光元年《元孟辉志》：

太祖平文皇帝高凉王七世孙……永平之年，解巾给事中，时始八岁矣。有诏入学，听不朝。直年七丧亲，哀毁过礼，十三亟罚，几致灭性。兄弟少孤，善相鞠育，友于之显，遐迹所闻。一员东省十有余年，朝廷以肆业不转。君以乐道不迁，左琴右书，逍遥自得。

正光四年《元秀志》称：

君禀黄中之逸气，怀万顷之渊量，器宇深华，风尚虚远，才见通洽。故早树声徽，幼播令誉。好读书，爱文义，学该图纬，博观简牒，既精《书》、《易》，尤善礼传，棲迟道艺之圃，游息儒术之藪，虽伯业不倦，宣光纵横，无以尚也。

正光四年《元斌志》：

恭宗后，京兆王孙，元润子。……虽名拘朝员，而心棲事外，恒角巾私圃，偃卧园林，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性简贵，慎交游，门察杂游，庭盈卉木，虽山阳之相知少，颖阴之莫逆希，以斯准古，千载共情也。

正光六年《元茂志》：

恭宗后，乐陵密王第三子…君性好俭素，□□□平，出入黔宇，去来疎苑，颇复琴诗拘意，未尝荣禄□心。或门谒八俊，日洞千数，又家无一帛，书有万筐。

孝昌元年《元焕志》：

献文后，赵郡王孙，相州刺史之子。……去彼所天，来慕大国……又爱诗悦礼，不舍斯须，好文玩武，无废朝夕，味道入玄，精若垂韦，置觞出馆，懽同林下。故眈眈之韵，高迈群王，斌斌之称，远闻圣上。

武泰元年《元举志》：

字景升……龀而小学，师心功倍，冥讯迅捷，卓尔殊佚。坟经于是乎宝轴，百家由此兮金箱。洞兼释氏，备练五明，六书八体，书妙超群，勾章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性，左右琴诗，故潜肆衡门，声播霄岳。

武泰元年《元暉志》：

王孝情天至，友爱特深，悦善好名，宽仁容众。学涉坟史，雅好诗文，草隶之工，迈于钟、索。

建义元年《元悌志》：

博览文史，学冠书林，妙善音艺，尤好八体。器寓淹凝，风韵闲远，丽藻云浮，高谈响应。信可两尧年之一足，九汉世之八龙，望紫烟以腾骧，陵清风而騫翥。故能异于公族，独出群辈者矣。

建义元年《元劭志》：

清河文献王第二子也。……王孝乎天纵，忠实化远，闺庭睦睦，无可间之言；朝廷侃侃，有匪躬之誉。赋山咏水，辞爱三春之光，诛丧褒往，文悽九秋之色。至于西园命友，东阁延宾，怀道盈阶，专经满席，临风释卷，步月弦琴。目丽五行，指□三调，布素之怀必尽，风流之貌悠然。

建义元年《元彝志》：

学年标乎令问，冠岁备以成德。熙平之始，王犹在佩觿之辰，孝明皇帝春秋富冲，敦上庠之学，广延宗英，搜扬俊乂，……入为侍书。……性乐闲静，不趣荣利，爱黄老之术，尚恬素之志，清思参玄，高谈自远，宾延雅胜，交远游杂。

建义元年《元顺志》：

字子和。……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檐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虽复孙弘居相，王修处官，曷以过也。

建义元年《元湛志》：

爱山水，玩园池，奇花异果，莫不集之。嘉辰节庆，光风同月，必延王孙，命公子，曲宴竹林，赋诗畅志。性笃学，元好文藻；善笔迹，偏长诗咏。祖孝武，爱谢庄。博览经史，朋旧名之书海。

建义元年《元恩志》：

君自少及长，典籍是务，禀性纯和，久而弥亮。

建义元年《元天穆志》：

神质自成，孤贞特秀，八素九丘之理，靡不洞其幽源；三坟五典之书，故以极其宗致。

建义元年《元子正志》：

自始服青衿，爰启绋帙，好问不休，思经无怠。遂能搜今阅古，博览群书，穷玄尽微，义该众妙。谅以迈迹中山，超踪北海矣。加以雅好文章，尤爱宾客，属辞摘藻，怡情无倦，礼贤接士，终宴忘疲，致邹、马之徒，怀东阁而并至；徐、陈之党，慕西园以来游。于是声高海内，誉驰天下。

太昌元年《元袭志》：

字子绪，……君禀和气象，钟美川岳，廉贞孝友，因心自得。清风峻节，秉襟独远，不假色于朱蓝，宁资深于羽括。错综古今，贯穿百氏，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之精微。纂思绮合，摘文锦烂，信足方驾应刘，连横潘左。又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

酬应如响。虽郭象之辨类县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之。

太昌元年《元文志》：

献文帝曾孙，文穆皇帝孙……生而奇骨无双，孩而日新月就，五岁诵论、孝，声韵清辩，以为有祖之风焉，孝庄帝特加宠爱。

永熙二年《元赞远志》

父文王，才藻富丽，一代文宗。……性开达，好施与，不事产业，道素自居，虚己待贤，倾身下士。宾客辐凑，冠盖成阴。绸缪赏会，留连琴酒。风韵恢爽，与青松等峻；逸气高奇，共白云俱远。不持小节，有倜傥之才，虽鸿翼未舒，固以远大许之。年渐成立，志闲丘壑，遂负帙入白公台山，下帷潜读。学贯儒林，博窥文苑。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览；登高夹池之赋，下笔成章。风流间起，谈论锋出，时观鱼鸟以咏怀，望山川而卒岁。

上面所引均为元氏宗室人物的墓志，与元氏人物相比，其他鲜卑贵族墓志很少，但从不多的墓志中亦可见到他们好文情况的描述。如熙平元年《吐谷浑玑志》称：“君处武怀文，博畅群籍，志录经史，……善文艺，爱琴书，系竹声席，超然独悟。”正光二年《穆纂志》：“君又好文而能武。文随风举，武逐云奔。若乃锋谈电飞，兴连云水，皆率然巧妙，辞旨攸攸。先觉之士，盛以为王佐之才。”普泰元年《穆绍志》说：“风情简旷，伏膺雅道，敦好经术，钻六艺之膏腴，游文章之苑囿。由是风流藉甚，朝野倾属。”

墓志内容当然不可尽信，如《魏书》卷27《穆崇传穆绍附传》说穆绍“无他才能，而资性方重，罕接宾客”，与《穆绍志》所说相去甚远，但这至少可以证明，北魏后期，以文化水平高低为衡量人物高下已成风气。《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孝文帝弟元雍在明帝时为灵太后所信重，执政，但“识怀短浅，又无学术，虽位居朝首，不为时情所推”。有无“学术”确实是当时评判人才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

北魏迁洛以前，出于培养鲜卑族文化人才及提高鲜卑贵族统治能力的考虑，较为重视官方学校建设，太学、国子学（后改称中书学）先后建立，冯太后执政时，于州郡遍设立学，并设皇宗学专门教育皇室子弟。孝文帝迁洛，对京师学校亦作了相应的规划，但官方学校一直未能进行实际的教学活动。《魏书·儒林传序》说：

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靡以好爵，动貽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

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

孝文帝下诏于洛阳设立各级学校,宣武帝“复诏立国学”,但“黉宇未立”,神龟中复“将立国学”,而“仍复停寝”,均反映了迁洛后新都洛阳官方学校未能设立的事实。同书卷54《李崇传》记其于灵太后时上书言事,提及学校时,称孝文帝时虽有学校规划,但“经始事殷,戎轩屡驾,未遑多就”,而宣武帝“永平之中,大兴板筑,续以水旱,戎马生郊,虽逮为山,还停一匮”,所以“皇迁中县,垂二十祀”,但“胶序德义之基,空盈牧竖之迹”“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研究者或因迁洛后官方学校不立,遂认为孝文帝迁洛汉化与文治的初衷并未实现,但明帝之时“文雅大盛”^③,以及鲜卑族上层文化进步确为事实,他们接受文化教育,当别有途径。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④而家族教育除了直系亲属对下一代的教育外,家族出资设立学馆,延师教授,亦是一种普遍的方式。《北齐书》卷34《杨愔传》:

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学庭前有柰树,实落地,群儿咸争之,愔颓然独坐。其季父暉适入学馆,见之大用嗟异,顾谓宾客曰:“此儿恬裕,有我家风。”宅内有茂竹,遂为愔于林边别葺一室,命独处其中,常以铜盘盛饌以饭之。因以督厉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铜盘重肉之食。”

这是十六国北朝世家大族家族内教育的典型史料,鲜卑贵族士族化以后,亦受其影响。《魏书》卷19上《阳平王新成传元钦附传》说:“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反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渐,于是待客稍厚。”温子升初“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见而善之,故诣渊谢之。景曰:‘顷见温生。’渊怪问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渊由是稍知之。”^⑤延请人教“奴子”识写文字,自家子弟的教育当更受重视。任城王元澄子元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⑥大儒刘兰兼通《五经》,“又明阴阳,博物多识,为儒者所宗”。“特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等。兰学徒前后数千,成业者众。”^⑦元熙、元诱、元略兄弟在孝明帝时以才学知名,其最终的学养虽非刘兰传授所致,但启蒙教育无疑有赖于学馆。鲜卑贵族采用汉族世家大族的方式教育子弟,也是鲜卑贵族世族大族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鲜卑族上层文士化的基础。

迁都洛阳后,鲜卑族上层的文士化倾向,不仅表现在鲜卑贵族进行家族教育,使子弟识文断字,从而免“面墙”之讥,而且表现在接受南方上流社会学风的影响,崇尚文学、老庄玄学,并热衷于士林间的文学交往与相聚清谈。